

在民族灵魂的深处

高亚彪 吴丹毛 著

IN THE DEPTH OF THE SOUL OF A NATION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在民族灵魂的深处

IN THE DEPTH OF THE SOUL A NATION

高亚彪 吴丹毛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十月

在民族灵魂的深处

高亚彪 吴丹毛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197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 000册

*

ISBN 7-5059-0844-8 /I·584 定价:2.85元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副金缕玉刻、镶嵌着宝石与珍珠的镣铐，它桎梏着中国人的灵魂和手脚，而中国人却以此为美丽和自豪。我们认为……

——作者

目 录

导 言 针的启示	(1)
第一章 寻根探源 (文化隔离机制)	(5)
一、大禹治水 (农耕文化)	(7)
二、千帆相竞 (航海文化)	(13)
三、万马奔腾 (游牧文化)	(16)
第二章 三足鼎立	(19)
一、血缘家族	(19)
二、宗法社会	(24)
三、家国之间	(39)
第三章 理想人格	(44)
一、君子风度	(44)
二、英雄本色	(70)
第四章 白马驮经 (文化交流机制)	(78)
一、佛陀世容	(78)
二、灵光普照	(81)
三、鼎立三足	(104)
第五章 长城内外	(110)
一、狂飙铁骑	(110)
二、长城效应	(118)
第六章 天朝心态	(131)
一、一统观念	(132)

二、小农意识	(141)
三、至尊思想	(148)
第七章 合金文化 (日本文化)	(159)
一、引进文明	(160)
二、合金特质	(168)
三、集团意识	(174)
第八章 文化合金 (美国文化)	(184)
一、民族熔炉	(186)
二、个人主义	(193)
三、他山之石	(211)
第九章 灵魂涤荡 (文化选择机制)	(217)
一、文化选择	(216)
二、心灵冲击	(227)
第十章 涤荡灵魂 (文化出路)	(236)
一、现代世界	(236)
二、双重制约	(244)
三、求解程序	(250)

导 言

针 的 启 示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禅宗神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家外国报纸刊登了一个有趣的假设：

在一间房子里落下了一根针，屋内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意大利人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离去；法国人顺手拿起一把扫帚把地扫了一遍，至于针是否扫了出去并不十分在意，得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德国人则用一把尺子和一根粉笔把地板划成一个个小方格，在每个格子里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这根针。刊登这个假设的目的是为了根据三国在二次大战中的不同表现，更加形象地说明三个民族的性格差异：意大利人散漫、松懈，是一个缺乏内聚力与向心力的民族；法国人浮躁、易变，是一个满足于大体上过得去，而缺乏彻底求实精神的民族；而德国人笃实、稳重、富有哲学头脑，德意志民族有一种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

至此，我们禁不住要做进一步的假设：如果中国人在场会怎么办？大概会有两种表现：一是用一块磁铁就地一滚，把针吸了

起来，这是文明古国勤劳智慧素质的体现；但同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就是人与针会在此屋中共终生，这是因循守旧、不思变更的封建腐朽意识的表现。

当然，这仅仅是假设。这种分析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准确性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生存条件各异，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别。由心理构成和行为构成所体现的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别，经过千百年漫长的历史进程，已经根深蒂固地融汇在本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血液里，一个人的言行无论有意或者无意总会打上民族的烙印，并且由于民族文化特别是其深层心理构造具有相对的历史稳定性，它曾经、并且正在继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例如，具有四千年文明史的印度民族曾经在百余年的岁月里彻底沦为殖民地，这不能不说与其追求彼岸世界的探索、仰慕消极的永生的“梦幻式”心理构成密切相关；而注重现实的人际关系、推崇“身份制”人伦原则的“仁”的观念，毫无疑问对形成并维系宗法一体化统治结构，至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起着巨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些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在面临同样或十分类似的问题时，往往会采取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行动。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仅从经济的角度去探索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这就常常使我们在许多历史现象面前感到困惑：

为什么古老的埃及帝国在长期的僵滞后退终于衰亡，而古老的中华民族却在兴衰往复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印度相对地却平静无事？

为什么以色列灭亡数千年，犹太子孙分散

在世界各地，却能在二十世纪重建国家？

为什么近代两次世界大战都由德国挑起，而几次彻底的民主革命都发生在法国？

为什么希腊人留下如此丰富的哲学、文学、艺术、科学遗产，而强盛得多、绵长得多的罗马人却望尘莫及？

为什么考古挖掘中发现希腊有那么多裸体人像，而中国发现的则多是祭器和食具？

为什么在西方，游牧铁骑的侵扰使欧洲迅速完成了封建化进程，而在中国却同工而异曲，造成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为什么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许多在国外被证明完全成功的经验借鉴到中国后却产生了全然相反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不是经济原因所能简单加以解释的。社会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综合演化的产物，因此必须从更宏观的背景和更深的层次去挖掘隐蔽在上述历史具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运行机制，特别是这一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主体——人的心理蕴含及构成。这，就是文化学的研究范畴。

作为科学的概念，文化学所讲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可以细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文化——指物质文明；中层文化——指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识化了的物质，即行为、理论、制度等；深层文化——即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凝聚而成的心理积淀。文化学的研究范围是如此广泛，它涉及人类文化产生的客观环境，不同环境对文化特质的影响，不同特质的文化系统产生、发展、交流、融合的演化机制，不同层次文化的交互作用以及人的主动性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相互关系等各个领

域。文化学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已不再满足于探索物质世界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行为的本质特征，而是希望把握人类自身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规律及其成因，特别是这种规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以便使人类的活动进一步由自发转向自为。

中国正面临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转变。百余年来，尽管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的复兴前赴后继，尽管一批又一批知识精英不断探索、研究、学习、摹仿、借鉴其他民族成功的经验，但现代化事业仍然屡屡受挫。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自身，终于爆发了五四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中华民族向现代社会挺进的时候，十分自然地又一次出现了“文化热”。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多的人在徘徊、在痛苦、在思考、在探索。不管怎样，这是可喜的、值得欣慰的，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从懵懂状态的幼年走向具有自觉意识的成年的重要标志。

第一章

寻根探源

●大禹治水

●千帆相竞

●万马奔腾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屈原《天问》

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将世界文化划分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类型。的确，在各大文化中，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最具特色，并在各自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以迥异于其他二者的精神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生活圈（印度文化圈包括南亚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如今天的斯里兰卡、孟加拉、缅甸、泰国等地。希腊文化圈包括南欧甚至整个欧洲并通过移民传播到美洲。中国文化圈则包括今天的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这种精神价值体系集中体现在人生意义探求方面的审美理想上。

印度民族追求美的永恒形式，希腊民族追求美的个体形式，中华民族则追求美的历史形式。印度人“对整个社会没有责任，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人企图使他感到他和社会的连带关系”，^①印度人的智慧与兴趣远离了中国人心灵关注的领域，他们关注的是我们很少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重视生命对永恒的价值，仰慕消

^① 尼赫鲁《印度社会》。

极的永生，倡导自制、自苦与自我牺牲。那位坐在菩提树下苦苦思索“把我从死亡引到不死吧”的乔达摩·悉达多是他们的代表。希腊人重视生活对个人的价值，他们仰慕美丽的肉体、英雄的性格与现实的欢乐，健美的赫克利斯与阿其里斯是他们的代表。中国人则重视个人对社会——包括家庭、亲友、国家和历史的价值。他们仰慕安邦定国、名垂青史，以丰功伟业为后人称颂，“完璧归赵”中的蔺相如与“赵氏孤儿”中的英雄主角程婴是他们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千万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印度民族的优秀儿女用博大精深的智慧思索过无数有情的人生，以千万计献身于永生的追求；希腊人则在英雄事业、商业活动、探索自然奥秘与个人的冒险中表现出最大的热情与勇敢。

三大文化具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差异引导（只是“引导”而不是“决定”）各民族的历史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造成并继续影响着民族的现状与未来。至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差异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或者是象美国考古学家亨利·弗兰克福特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知的，寻找文化起源的努力“只能使一个学者误入准哲学的准则的歧途，或迫使他作出伪科学的回答”？^①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不可知论调。事实上，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只能在对不同文化产生的客观环境的比较中进行探索。远古时代，由于交通工具的不便，高山、大海、荒漠构成了各民族间的天然屏障，使文化在产生过程中具备了首要的“隔离机制”。文化隔离是比较文化学的重要原理之一。所谓文化隔离机制是指造成并维护民族文化成为独立的定型的文化形态的机制。民族文化的最初形成，没有文化隔离是不可能

① 亨利·弗兰克福特《近东文明的诞生》。

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彼此无限度的交流，会使民族文化系统湮没于不停顿的文化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因而无法在特定的环境中凝聚、积淀而不被瓦解，最后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文化隔离的方式有多种，包括地理环境隔离、社会隔离（人种、语言、社会结构、战争等）和心理隔离（民俗、原始概念、思维方式等）。对于文化形成期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理环境的隔离。天然地理屏障使各大文化系统之间缺少交流，只能在各自内部环境中自我调节、独立发展，形成不同于他者的特征。因此，地理环境分析是破译文化“密码”、解开文化差异之谜的关键所在。

一、大禹治水

中国文化诞生于东亚大陆，这里东濒茫茫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种一面临海，其他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获得了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在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平坦的地势，温暖的气候，充沛的水源，茂密的丛林适宜发展农业。而东部濒临太平洋，没有较近的海上邻国，西北和西南又为沙漠和高原所阻，因此无论海上通商或陆路贸易都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只能以农耕为主，农业是中华民族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国很早就从采集野生植物果实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上古传说中三皇中的神农氏就是因为“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因为这里培育出了适应黄土高原的

自然环境的农作物——稷，也就是小米。“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麦”，^①其中的禾就是小米。被周人尊为始祖的弃，在儿童时代“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号曰后稷。”^②可见当时这个弃已懂得选择适当的土地从事耕种，连他的名字也选择了农作物的名称，称为后稷。据此可以推知，早在六七千年以前，中国的农业技术即已相当发达了。

生产方式属于文化表层结构即物质文明的范畴，以农耕为主的表层文化特征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并对文化的中层结构（制度文明）和深层结构（意识形态）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1）以治理水源为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制、一统的制度特征和抑制个性、推崇集体意识乃至个别权威的心理特征。（2）靠天吃饭，较多地依赖自然、顺应自然，因此在心理结构方面信奉“天人感应”原则，求善的要求高于求“真”。（3）生活虽然艰苦，却有稳定的保证，造成了求稳、求静的心理趋向。这三方面的特征基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的轮廓雏形。

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远古时代，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大规模的体力协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黄土高原邻近的山地和广延的植被，为群体定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石块、树木等构巢筑屋的材料，使人们在耕地附近组成一个个定居村落成为可能，至今在黄土高原上还保留着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人力的集中造成集约的耕作技术和连套的灌溉方式，并为大举治理水源提供了

① 《诗·豳风·七月》。

②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人力基础。在体力协作时，每个人都必须抑制自我的个性，服从强有力的绝对权威的指挥，因此集体意识得到根深蒂固的加强，同时社会在集体协作中更加趋于复杂。伴随对水源的治理和分配，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治王朝——夏。据《史记·夏本记》记载：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
下民其忧……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
不息，功用不成……舜登用……行视鲧之治水
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
而使继鲧之业。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
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
川。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
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
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川，通九道，
陂九泽，度九山……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
子位……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
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有
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
天下咸朝。

这段记载生动地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大禹治水的过程，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各种运载工具，似乎还有许多高明的测量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记载了夏王朝的建立过程。大禹治水的功劳深深为人民所敬仰，尽管他死后也保留了“禅让”的形式，把帝位让给益，然而此时他的儿子启的势力已经很大了，这就决定了世袭制的产生。启得到帝位后，出兵战败了不服的有扈氏，此时天下也就不得不“咸朝”了。

专制王朝的产生虽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进步，但它

毕竟开始了“血淋淋”的历史。在集体协作中产生的指挥者成了专制君主，人民的个性与自我意识进一步受到限制甚至摧残，从此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不可能得到尊重。世袭制造成了君主家天下的局面，专制王权的管理职能通过各级官僚来行使，造成了人际关系的身份制，使本来就不尊重个体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理性都倾注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上。团结协作过程中产生的集体意识在身份制的引导下，变成单方向上的服从义务，并通过伦理原则将其固定下来。中国式农耕文化的雏形就是这样开始萌芽的。

靠天吃饭是农耕民族的第二个特点。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依赖自然，被动地适应自然多于对自然的抗争。“老天爷能养活人，也能毁坏人”是一句老话。在广漠无垠的平原上，劳苦的中国农民受制于气候，依靠老天爷赐给阳光和雨水，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人对上天的恐惧和崇拜，因此，在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原始宗教。严格地说，中华文化在上古时期应该分为两支，即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南方文化。两者都是农业文化而略有差异：北方种稷，南方种稻兼以捕鱼，秦岭——淮河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屏障。在南方主要生活的是三苗的一支，他们虽然与周围的各民族有一定的交流，但直到周代为止，一直保持自成体系的发展。尽管后代交流日益频繁，但南北文化的特色却始终存在，这一点在原始宗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北方文化中，原始宗教的形式是卜和筮，卜和筮即是“打卦”、“算命”，其核心在宗天、宗祖。中国人很少有独立的、超越人世的神的概念（当然，上古时期有一些，特别是在南方，但由于后世儒家文化的强烈排斥，终于少而又少了），他们膜拜的是冥冥中的不可知的“天”和死去的先人。在一定的时令内要祭祖、祭天，在重大事件如出征、婚嫁、收获、建筑重大设施时也要征求祖先或上天的同意，这一切

都是为了得到佑护。上天和祖先的意志通过卜与筮传给人类，卜是将龟壳焙裂而观其纹，筮是将草策揲折而观其数。使用的龟壳与筮草有特殊的要求：龟千岁而满两尺；蓍百茎而上有青云。天和祖的意志就在这纹象与蓍数之中。这一切都十分复杂，必须有专职的祭司和神职人员担任，这种人被称为太卜，他们的解释代表天、祖的意志，因此有很大的权力。但是由于后人将卜与筮的方法记录下来，使之广为流传，所以太卜的地位衰微了，加之专制王权的强大，终于没有形成后来基督教世界的那种神权与王权分离、两权并立，相互制约，有时超越王权的局面。由于王权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决定的意义，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认为君王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因此称君王为“天子”。君权与神权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王权的权威性。而对祖先的崇拜则构成了宗法制度的心理基础，一旦将宗法制度与王权结合，君、神、父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便告形成。在南方文化中，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是巫。巫，古作，是两人相对而起舞。南方民族认为，祖和天可以降临在巫身上。巫也是专职的，他们出于民间，不任官职，并熟悉山川、神话与医道。他们将采来的带有麻醉性的草药吃下或涂敷于身体的某些器官，使自己处于幻觉之中，然后狂舞，因此巫与医连称至今。现在在落后地区仍有神汉、巫婆跳神以治病。巫由于不任官职，所以其权威较北方的太卜尤微，同样不能构成对王权的制约，这一点十分重要，它使后代南北统一的集权王国的建立成为可能，因为一个独尊王权的文化与一个神权、王权分离的文化相融合，其心理方面的隔离机制将发挥极大的效力。神权与君权的结合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进一步要求人们将个人的权力转嫁出去，进一步压抑个性和自我意识。对上天、祖先及大自然的依赖与被动的适应，要求人们调节自我的行为，主要是以善行感动上天，求它赐给风调雨